

中国
文化
知识
大观
园

科技军事卷

辽海出版社

军事间谍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 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 · 科技军事卷 •

军事间谍

(上)

邢春如、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辽海出版社

目 录

一、间谍史话	(1)
间谍萌芽期	(1)
间谍发展期	(4)
间谍鼎盛期	(17)
二、间谍理论与机构	(22)
(一) 间谍理论	(22)
《孙子兵法》	(22)
《六韬》	(26)
《李靖兵法》	(29)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32)
杜牧注《孙子》	(35)
《草庐经略》	(37)
《投笔肤谈》	(38)
《兵经百字》	(40)
《间书》	(44)
(二) 间谍机构	(47)
战国养士	(47)

秦汉魏晋南北朝间谍机构	(51)
隋唐间谍机构	(54)
宋明清间谍机构	(57)
三、间谍技术与称谓	(67)
(一) 间谍技术	(67)
窃听	(67)
通讯	(68)
密码	(74)
代号	(80)
隐语	(81)
暗器	(84)
毒药	(86)
密写	(87)
化装	(88)
伪造	(89)
拆封	(90)
密藏	(91)
(二) 间谍称谓	(92)
邦交	(92)
邦谍	(93)
间	(93)
间人	(93)
间伏	(93)
间使	(94)
间探	(94)
间谍	(94)
谍	(94)
谍者	(95)

谍候	(95)
谍贼	(95)
游士	(95)
游侦	(95)
候	(96)
候人	(96)
候谗	(96)
候正	(96)
候官	(96)
虞候	(97)
覷	(97)
侃	(97)
觐	(98)
觐候	(98)
怪	(98)
乡导	(98)
奸细	(98)
奸人	(99)
细作	(99)
耳目	(99)
眼线	(99)
眼目	(99)
行人	(100)
寮子	(100)
寮事卒	(100)
寮战	(100)
探事卒	(101)
卧内	(101)

侦	(101)
侦罗	(101)
侦谋	(101)
侦候	(101)
跳河与两来	(102)
爪探	(102)
广探	(102)
采探	(102)
四、间谍谋略	(103)
冒名顶替	(103)
嫁祸于人	(103)
推入黄河	(104)
家中闹鬼	(105)
老马识途	(106)
出没无常	(106)
一箭双雕	(107)
暗箭杀人	(108)
重金收买	(108)
攻心为上	(109)
封官许愿	(111)
隔墙有耳	(112)
跟踪蹑迹	(112)
生花妙笔	(113)
摇唇鼓舌	(114)
隐姓埋名	(115)
乔装打扮	(115)
入境问禁	(116)
大智若愚	(117)

插科打诨	(117)
头顶悬剑	(118)
投石问路	(119)
投骨于犬	(120)
推倒油瓶	(121)
滥竽充数	(122)
多间并用	(122)
唱筹量沙	(124)
联姻灭亲	(125)
抓雏引母	(126)
打骂为亲	(127)
诱敌骑墙	(127)
里应外合	(128)
杀人灭口	(129)
挑虎相斗	(130)
螳螂推丸	(131)
疑能生鬼	(132)
量体裁衣	(133)
苦肉计	(134)
五、用间奇计	(135)
巧施反间计,弱晋败强楚	(135)
以假乱真,吓退强敌	(136)
卫鞅宴擒公子卬	(137)
孙臆减灶杀庞涓	(147)
勾践卧薪尝胆败夫差	(149)
假象惑敌,火牛阵立奇功	(154)
赵奢的反间计	(156)
东汉建立内幕	(157)

虞诩增灶惑羌兵	(159)
李广疑兵斗匈奴	(162)
反间反为反间害	(165)
曹操谈笑设间计	(168)
关羽大意失荆州	(169)
一封间谍信	(177)
前秦军草木皆兵	(180)
檀道济隐饥示饱退强敌	(184)
孝宽编歌除奸	(187)

一、间谍史话

间谍萌芽期

世界第一兵书《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可见被称为“东方兵学鼻祖”的孙武很早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了“知”与“战”的内在联系和实施次序。即“知”与“战”二者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只有先“知彼知己”，然后方能“百战不殆”。正如春秋军事家管仲所说：“不明于敌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之士，不先陈也。”所谓“知”和“明”，实际上就是间谍情报活动，而其显然又是为战争服务的，所以说战争是间谍的温床，而间谍则是战争的产儿。因此，要探间谍活动的起源年代和产生原因，就必须先追溯战争的源头。

战争，在甲骨文中称为“争”或“伐”，也称为“战”、“兵”、“戎”、“征”等，“战争”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吴子兵法》一书。据文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战争为“原始社会末期战争”（距今约五千年）。如“神农伐斧燧之战”；“黄帝、蚩尤涿鹿之战”；“尧攻驩兜丹水之战”和“舜、禹对三苗之战”等。在“舜、禹对三苗之战”中，禹就是根据“三苗蠢蠢欲动，图谋不轨”的情报而兴兵讨伐的。据《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时，“执玉帛者万国”，荀子也说：“古有万国。”又因为当时存在“邦无定交，土无定主”、“朝约婚姻，夕结冤家”、“明为盟友，暗为仇敌”这种错综复杂、扑

朔迷离的多变局面，使得“以石为兵”的参战或观战各方，都极力想探察敌方的虚实和窥视邻族的意图，从而避免盲目行动。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战争的特定需求下，“知彼知己”的这一永恒真理，便在战争实践中自然而然地萌芽产生了。而“知彼”的这一任务又势必要由专人承担执行，这样的人，就是间谍。

因此，古代中国的间谍活动应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战争的出现应运而生的。

纵观世界历史，中国的间谍活动的产生年代当居其之首，并且有文字记载的间谍人物也是世界间谍之始祖。目前国内史学界有人认为：“人类最早的间谍活动见于古希腊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特洛伊木马传说”；又认为《圣经》中所提到的娣莱拉是“地球上第一个女间谍——情报鼻祖”，孰是孰非？还是以史实来回答吧。

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特洛伊木马”传说是这样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了斯巴达王后海伦，斯巴达王兄阿伽门农率领大军远征围攻特洛伊九年不下，后采用“智囊”奥德修斯之计，将一批精兵埋伏在一匹大木马腹内，放在城外后佯装退兵。特伊洛人把木马当作战利品搬进城内。夜间，伏兵从木马中出来打开了城门，希腊军乘机涌入，摧毁了特洛伊城。

根据这一传说和后世学者对特洛伊城遗址的发掘考证，“特洛伊木马”之事发生在约公元前十二世纪，而中国春秋古书《左传》明文记载了“少康使女艾谍浇”一事，却在约公元前二十世纪，早于“特洛伊木马”之事达八百年之久。

《圣经》中记载约于公元前十世纪时，在地中海东岸的菲利斯部落里有一名少女叫娣莱拉，她在希伯莱人与菲利斯人的一场血战中，被希伯莱士兵俘虏，惨遭蹂躏，后被一牧羊老嫗救出。菲利斯酋长为了谋杀希伯莱勇士参孙，便派娣莱拉对参孙进行色

情间谍活动。参孙果然中计，并于酣睡中被剪去聊以维持体力的七络头发，只得束手就擒。菲利普酋长下令用参孙的头去祭祀夏收节。参孙在被押进神殿时，怒视了娣莱拉一眼，便一头撞塌了神殿，与娣莱拉同归于尽。事后，希伯莱人厚葬了参孙，也出人意料地厚葬了娣莱拉，并在她的墓碑上刻道：“她毁了一个英雄，同时却也造就了一个英雄……毕竟她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能这样做的女人。”

在中国战略《吕氏春秋》一书中则记载了早于娣莱拉六百年前，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夏末的一件女间谍案例。商汤派伊尹为间谍，多次打入夏朝内部，并收买了夏桀的宠妃末喜，末喜向伊尹提供了夏桀军事部署的绝密战略情报，从而使商汤制定了正确的作战计划，终于推翻了夏桀，建立了商朝。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不仅在诸多领域中创造了许多世界之最，而且也首开世界间谍史之先河，成为世界间谍史的源头。

由于年代久远，夏、商两代的间谍活动文献记载稀少，仅见“女艾谍浇”；“伊尹间夏”；“末喜泄密”；“吕牙间商”；“崇侯虎侦监姬昌”；“姬发使间探朝歌”；“祖伊暗察国人”等几例，其中“伊尹间夏”和“吕牙间商”二例，被《孙子兵法·用间篇》引用。

纵观这一萌芽时期的各类间谍活动，具有两大特点：

一是间谍活动的范围仅限于军事领域。从被称为“间谍始祖”的女艾所从事的间谍活动来看，其全部活动都是围绕军事斗争而展开的。这时期的间谍理论尚未形成。虽然相传论及用间的古兵书《六韬》是吕牙所著，但经历代学者从内容及文字结构上考证，断定为战国时人伪托，非殷商时之作。此外还值得指出：夏商二代的间谍活动不仅具有战术性，而且更具有战略性。“伊尹间夏”的案例便能说明这一点。

二是这一系列间谍活动都是由最高统帅直接派遣、指挥。少

康与女艾；商汤与伊尹；周文王与吕牙；商纣与崇侯虎等，都是君与臣的关系，也都是在最高层进行的。这些间谍活动为后世春秋的孙武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用间史料，成为《孙子兵法·用间篇》的理论基础。正如《孙子兵法》所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当时的用间，实际上成了君遣臣行的状况，其层次规格之高，令人惊叹。由于少康首开以臣子女艾为间之端，后世历代君主均步其后尘，视间谍活动为制胜之宝，而且还不断扩大其范围，并愈演愈烈，以至于几乎在所有对抗性领域中都广泛地展开间谍情报活动。

间谍发展期

周武王姬发在牧野之战中，一举击败商军，纣王自焚而亡。周武王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巩固新建立的王朝。为了控制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他表面上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地，暗地里却派自己的兄弟三人，留在殷地监视武庚的一举一动，史称“三监”。这一政治性的内部监控事件，打破了以往间谍活动仅用于军事和针对敌方的局限，扩大了间谍活动的领域，对后代的影响极为深远。从金文史料看：周武王在分封诸侯时，也照例设置像“三监”一样的“诸监”。如《仲纪篋簋》记载道：“仲篋父使篋使于诸侯诸监”。表明“诸侯”与“诸监”并存。“诸监”是中国最古设置的间谍专职官员。

至周王朝第十代国君周厉王时，政治性监控活动达到了高潮。由于周厉王“暴虐侈傲”，因此招致“国人谤王”。周厉王盛怒之下，便派遣了卫国的巫士，“以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监，察也，以巫人神灵，有谤毁必察也。”当然，周厉王并非凭借一个巫士或所谓有“神灵”就能“弭谤”，他主要采用的就是派遣间谍对国内臣民进行

政治性间谍侦察和控制。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又记载道：“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说明周厉王后期对臣民进行了大规模的严厉监控，竟然使得人们在对面相遇时，也不敢以言论王，惟恐被周厉王的间谍听见，只得互相使个眼色，以表示内心愤懑罢了，可见其监控程度之深和范围之大。究其后世历朝历代的特务恐怖统治之由，莫不出于周厉王的这一“创举”。

反映周朝职官制的《周礼》一书，在《秋官》一章中记载道：“掌士之八成，一曰邦诇……三曰邦谍。”历代注家都认为“邦诇”和“邦谍”说的就是间谍和反间谍活动。《秋官》中所说的官职，是掌管“邦禁”的“刑官”，可见周代时已出现归属于“刑官”的严密而系统的间谍职官。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后，历史进入了东周时代，也就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据统计，在春秋战国的五百五十年间，共发生了614次战争，其中春秋为384次，战国为230次。又据唐代杜佑《通典·州郡序》记载：“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格局下，其战争的特点也是多方位的。即当时的战争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而是与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经济斗争和宣传斗争等紧密交织在一起，间谍活动的领域因此也大为拓展，并逐渐具有全局战略性，间谍的任务也由单一性扩大到集多任于一身。

各政治、军事统治者在这争霸称雄、兼并土地、以强凌弱的复杂激烈战争中，难以准确及时地驾驭风云多变、气象无常的战争进程，于是就特别借重和依赖于间谍，因为不“知彼”，就无法去“乱彼”，更谈不上去“破彼”。只有先“知彼”，才能因势制宜、随机应变和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说：战争产生了间谍，战争的发展也随之发展了间谍活动。间谍犹如战争的一个“身影”，随着战争的种种变化而相应变化。

春秋战国间谍活动的全方位展开和飞跃进展，说明了当时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了两个深奥的道理，即：一是军事斗争必须和政治、外交、经济、宣传诸领域的斗争有机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二是直接的军事对抗并非是打赢战争的惟一手段和最好办法，如果先掌握和了解敌方或他方的虚实，实际上就等于大大增强了己方的实力和削弱了敌方或他方的实力，甚至可以“兵不血刃”而战胜对方。这两点认识在春秋末期产生的《孙子兵法》中已经非常明确地将其理论化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实际上已经是进入了一个如宋代欧阳修所说的“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力”的高层次战争阶段。因此间谍的地位也日显其重要性。如《孙子兵法》所说：“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所以可以称春秋战国为“间谍黄金时代”。

春秋间谍史的头等大事，当属《孙子兵法》的问世。它的问世是古代中国间谍活动趋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孙子兵法》是世界第一部兵书，而其中的“用间篇”也是世界最早的用间专论，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孙武在“用间篇”中科学、缜密、系统、具体地论述了用间之利害意义、类别、作用、原则、纪律、任务、谋略、招募和范例，形成了完整的间谍系统理论，在当时及对后代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其中许多用间思想，在当代世界仍然是谍报界的基本指导思想，堪称为不朽的间谍理论。

《孙子兵法》实际上是对春秋前的各类战争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一部兵书，其中的“用间篇”也是在对以往间谍案例的归纳概括基础上，升华为理论精粹。反过来，也可以从“用间篇”中找到夏、商、周间谍案例及用间思想的明显痕迹。譬如：“用

间篇”中所说的“五间”，都能在三代间谍史中得到印证：

因间——城濮之战中，晋将先轸利用楚人掌握了解了楚军的情报，从而大获全胜；楚宋之战中，宋将华元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由乡间引路，竟乘夜进入楚营摸到了楚将子反的床上，胁迫楚军议和。

内间——越王勾践以吴国太宰伯嚭为内间，窃情报、乱吴国、杀忠臣，最终灭吴称霸；田氏家族派田豹打入权臣阍止家族充当家臣，探知阍止准备袭击田氏家族的机密，从而使得田氏家族先发制人，除掉了阍止。

反间——鄢陵之战中，晋将苗贲皇巧用楚军俘虏为反间，不战而胜楚军；平阴之战中，晋将范宣子以齐大夫析文子为友间，透露假情报，又制造了假部队，一举吓跑了强大的齐军。

死间——郑武公在袭击胡国前，以其女为死间，迷惑了胡君，乘其不备灭了胡国；吴王阖庐先后派专诸、要离为死间，成功地暗杀了政敌吴王僚及其子庆忌。

生间——史书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吕尚三就文王三人殷”，多次往返于双方；韩原之战中，晋惠公派出大夫韩简为间，韩简侦探到秦军军事秘密后，又独自返回报告。

春秋的间谍活动，除了在军事领域有了长足的进展外，也扩展到了政治、外交等领域。

公元前686年，齐国的公孙无知、连称、管至父和齐襄公的后妃，暗中联合监控齐襄公。当齐襄公后妃密告其在野外狩猎的行踪时，公孙无知等人便袭杀了齐襄公，发动了一场宫廷夺权的政变。

像专诸刺吴王僚，要离刺庆忌等行动性暗杀间谍活动，都属于政治间谍事件。

公元前629年，晋秦联军围攻郑国，郑文公于危难之际，采纳大夫佚之狐之计，派烛之武为间，夜缒城下，去秦营秘密游说

秦穆公。烛之武用晓之以利害的娴熟外交辞令，终于说动了秦穆公弃城而去，从而离间破坏了晋秦联军，保全了郑国。

公元前515年，吴王僚乘楚平王去世之际，兴兵伐楚。他又派季札出使晋国，以窥视中原各国对吴攻楚的反映，季札成功地刺探到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只因吴王僚被暗杀而束之高阁。

公元前484年，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受孔子委派，为了保全鲁国的安全，出使齐、吴、晋、越四国。他利用高超的外交手腕，连连得手，竟使四国的统治者对他言听计从，互相残杀。司马迁评论道：“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疆晋而霸越。”子贡堪称间谍外交大师。

秦秋时的间谍专职官员主要设置在军队中，其中以晋国最为突出。晋军专设“候正”或“候奄”一职，与军尉、舆尉、司空、司马同属一级官阶，具有较高的地位。正因为间谍情报对于国家、军队的存亡胜败具有重大的作用，所以在招募选择间谍上，多以“上智者”为间。然而，由于其进行的是“事莫密于间”的绝密活动，所以一旦败露泄漏，也将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

据《左传·宣公八年》记载：“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这是中国古代间谍史上最早见诸于史书的惩处间谍的记载。《左传·哀公十六年》又说：“楚太子建与晋人谋袭郑……晋人使谍于子木请行而期焉……郑人得晋谍焉，遂杀子木。”《周礼·秋官·掌戮》也说：“掌戮，掌断杀贼，谍而搏之。”郑玄注：“谍谓奸寇反间者，谍与贼罪大者斩之，小者杀之。”《孙子兵法·用间篇》则说得明白：“间事未发而先闻乾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由此可见，春秋时代在间谍的使用上已经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纪律制度，表明当时的间谍活动正趋于成熟。

战国间谍史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合纵连横的间谍活动为中

心。尤其是秦国，已经把连横间谍活动做为统一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如果说春秋时是“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那么战国时则是“国之大事，在间在戎”了。对此，司马迁在《史记》里已指出：“秦国阴遣谍士赍持金玉，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肯者，利剑刺之。”采用收买贿赂与暗杀行刺等软硬兼施的间谍手段，先是分化瓦解，扰乱破坏敌国内部，然后再配合以凶猛的军事行动，从而达到各个击破、统一六国的目的。

合纵连横的间谍代表人物有：魏国的公孙衍；秦国的张仪和范雎、顿弱和姚贾；燕国的苏秦和苏代兄弟等。他们的间谍活动常常带有战略性质，对于国家存亡、军队胜负有着巨大的影响和直接的利害关系。正因为如此，间谍活动也越来越受到各国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其中又以秦国的历代君王为其魁首。从春秋秦穆公策反西戎由余始，秦孝公、秦昭王、秦始皇等国君都极其重视用间。尤其是秦始皇可以说是战国高层用间的集大成者，像派间谍“行金万斤于魏”收买晋鄙门客为间，谗毁并借魏王之手罢免了秦国宿敌信陵君；“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使为反间”，致使赵国名将李牧被杀；遣顿弱携万金，“东游韩魏”，“北游燕赵”，大破合纵阵营；又于燕赵齐楚“四国为一，将以攻秦”之际，命姚贾约车百乘，载金千斤，出游四国，离间各方，以绝其谋，以罢其兵等，都是秦始皇的用间杰作。

战国其它领域的间谍活动也相当活跃。譬如张孟谈以外交手段策反韩魏联军；田单以宣传手段迷惑骑劫；赵奢以反间手段欺骗秦军；郑国以经济手段企图削弱秦国；燕太子丹以暗杀手段行刺秦王等，都比春秋的间谍活动范围大为扩展。

战国时期的间谍活动还有两个突出点：这就是私人间谍集团的出现和间谍技术的更新。

战国时，新兴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对旧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但却由于缺乏人才而步履艰难。于是招揽人才便成了